

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国著名将帅战争回忆录丛书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

战争回忆录

〔苏〕A. M. 华西列夫斯基 著
徐锦琳 思 齐 等译
何金铠 等校

A. M. ВАСИЛЕВСКИЙ



解放军出版社 / 出版

第二次世界大战外国著名将帅战争回忆录丛书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

〔苏〕A. M. 华西列夫斯基 著
徐锦栋 思 齐等译
何金铠 总校

解放军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战争回忆录/(苏)A.M. 华西列夫斯基
著;徐锦栋等译. —北京:解放军出版社, 2002

ISBN 7-5065-4391-5

I. 华… II. ①华… ②徐… III. 华西列夫斯基
(1895~1978)—回忆录 IV. K835.125.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109382 号

图字:军—2002—011 号

根据 A.M. ВАСИЛЕВСКИЙ

ДЕЛО ВСЕЙ ЖИЗНИ.

МОСКВА © ПОЛИТИЭДАТ. 1988 年版译出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北京国防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2003 年 1 月第 1 版 200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889 毫米×1230 毫米 1/32 印张: 17.125

字数: 485 千字 印数: 1—6000 册

定价: 37.00 元

华西列夫斯基元
帅（左）1943年与
布琼尼元帅（右）
在顿巴斯



1944年6月，华西列夫斯基（二排左四）和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审讯德军战俘



1944 年夏华西列夫斯基（右二）在白俄罗斯第 3 方面军指挥所



1944 年华西列夫斯基（右三）、伏罗希洛夫（左一）和方面军司令员托尔布欣（左三）
在乌克兰第 4 方面军指挥所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总参谋长华西列夫斯基在白俄罗斯战役前线指挥所



1945 年 9 月华西列夫斯基(左二)在远东战役指挥所



斯大林(右)、罗科索夫斯基(中)、华西列夫斯基(左)
在莫斯科红场阅兵观礼台上



卫国战争末期各方面军司令员合影。前排(自左至右)：苏联元帅科涅夫、华西列夫斯基、朱可夫、罗科索夫斯基、梅列茨科夫。后排：托尔布欣、马利诺夫斯基、戈沃罗夫、大将叶廖缅科、巴格拉米扬。

译者的话

亚历山大·米哈伊洛维奇·华西列夫斯基元帅是苏联著名军事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著名统帅，两次荣获苏联英雄称号，1943年获苏联元帅军衔。他生于1895年，1919年参加红军，1937年毕业于总参军事学院，1938年加入苏联共产党。

华西列夫斯基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历任连、营、团长、军区训练部长、总参作战部长等职。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期间曾任总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苏联最高统帅部大本营成员、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员、远东苏军总司令等要职。战后，华西列夫斯基曾任苏联国防部第一副部长、部长、总监组总监等职。

苏联卫国战争时期，华西列夫斯基经常以最高统帅部大本营代表的身份，亲临最重要的战线。他参加指挥了斯大林格勒会战、库尔斯克会战、解放顿巴斯和克里木的作战，在攻占塞瓦斯托波尔的作战中负伤。他协调指挥了3个方面军在白俄罗斯的进攻。曾任白俄罗斯第3方面军司令员，指挥过东普鲁士进攻战役。1944年秋，华西列夫斯基根据斯大林的指示开始考虑对日本作战的问题。1945年7月30日，他被正式任命为远东苏军总司令，直接指挥了远东战略性进攻战役，歼灭日本关东军830,000余人，俘虏594,000人。

据长期和他共事的长什捷缅科大将介绍，华西列夫斯基知识渊博，意志坚强、多谋善断、深思熟虑、作风正派、谦虚谨慎，从不吹嘘自己，绝不夸大个人的作用。

华西列夫斯基做为总参谋长和斯大林的得力助手，苏军的一切重大行动计划都出自他之手。其作战特点是决心大，每战力求合围敌人，断其退路，将其孤立，或分割敌军集团，尔后各个歼灭之。作者在书中具

体介绍了他是怎样制定作战计划及组织和实施一系列著名战役的。

由于华西列夫斯基长期在斯大林身边工作，他在回忆录中自然也经常提到斯大林。华西列夫斯基在书中充分肯定了斯大林为领导苏联军民战胜德国法西斯做出的巨大贡献；同时也指出：由于斯大林在对希特勒发动侵苏战争的时间上判断失误以及对德军的主要突击方面判断失误，造成了苏军在战争初期的失利。但他认为，斯大林在战争中的失误不应完全由他个人负责，大本营和总参谋部也有责任。例如战争爆发前对敌情的判断，情报部长就得出了错误的结论。

华西列夫斯基在书中谈斯大林的失误的同时，也反对赫鲁晓夫污蔑斯大林是“按地球仪指挥战争”。华西列夫斯基说：“斯大林的办公室里并没有地球仪，在他休息的房间里倒是有一个，不过很少有人被请到那里去。”

斯大林对干部要求很严格，绝不允许说一句假话。但他对犯错误的指挥员是实事求是的。例如北高加索方面军司令员彼得罗夫指挥部队进攻不得力，有人建议撤他的职。斯大林说：“要做的不是撤彼得罗夫的职，而是教会他进攻。要考虑到他从来没有进攻过。”作者深切感到，斯大林不仅积极帮助各方面军司令，而且重视教给他们制胜的艺术。哪个部队打了胜仗，他就在莫斯科给他们鸣礼炮庆贺。至于斯大林对他自己，华西列夫斯基写道：“据我观察，他任何时候都不讲自己的功劳。”“他的苏联英雄称号和大元帅军衔是根据各方面军司令员向党中央政治局的书面报告授予的。”

本书原名《毕生的事业》，1973年俄文版出版后，中间经作者不断修改补充，先后多次再版。这次我们根据莫斯科政治书籍出版社1988年第6版译出。新增“保卫列宁格勒”、“在总参谋部”两章，还增加了答读者问和后记。此外，其余各章也有很多改动。参加本书译校的同志有何金铠、徐锦栋、思齐、茂之、甘霖、玉泉、郝学兵、何文润、陶青、海伦、高云岗、尹小梅、何昌、钟林、金石、李兵、高峰、何山等。由何金铠总校。全书比我国以前译本增加了10万字左右。新增补内容正文以楷体排印。

2002年于北京

致 读 者

伟大卫国战争的严酷岁月已经成为历史了，但是，岁月的变化并不会使人们忘却它，也不会从人民的记忆中消失。我们对法西斯德国的胜利，不仅是对帝国主义反动势力的胜利，也是光辉的社会主义事业的胜利。

关于这场战争，已经出版了很多书。但人们对这类书籍的兴趣并未减少。每一部写这场苏联人视作神圣战争的真实的新作，都是我国人民为了自己祖国的自由和独立、为了和平和进步所立下的伟大功勋的新的见证。

在伟大卫国战争年代极端残酷的战火中，苏维埃国家及其武装力量经受住了考验，证明是坚不可摧的。苏联军事艺术的成熟，同当时号称资产阶级军队中最有经验的法西斯将领正面交过手的我军将领的素质，都受到了检验。

我感到庆幸和自豪的是，在祖国最困难的年代，我能全力参加祖国英勇的军队所进行的斗争，并和它一起饱尝了失利的痛苦和胜利的喜悦。

我国的军事干部在战争中成长起来，并得到了锻炼。我和苏联的其他军事首长一样，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成长起来并取得了作战经验。

伟大卫国战争初期我在总参谋部任职，任作战部副部长，少将军衔。1941年8月1日，根据党中央的决定，我被任命为作战部部长和副总参谋长。自1942年6月至1945年2月，我领导了总参谋部，同时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后来，我还担任过方面军司令员和最高统帅部大本营的成员，再以后还担任过远东军总司令。

可见，几乎在伟大卫国战争的整个过程中，我都同军队的领率机关

一直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在这本书中我要首先用较多的篇幅来讲讲最高统帅部、它的主要工作机构——总参谋部的活动,以及我军的主要领导干部——方面军和集团军司令员、军事委员会和参谋部的活动。

这本书是以我所熟悉的真实史料为基础的,而且这些史料又为档案文献(其中大部分是未发表过的)所证实。我写回忆录的主要目的是想说明辉煌胜利是怎样在苏联共产党的英明领导下取得的;向年轻的一代讲一讲我们的军事领导机关在卫国战争中运用了哪些方法和形式。在这场战争中我们也有过错误和失败,在书中我也将讲到这些。当然,它们并不是我们军人在走向胜利的艰苦道路上所经历的主要问题。

在这本书中,我想尽力说明苏维埃国家武装力量是怎样成长的,苏联军人的战斗素质和精神素质是怎样形成的,军事科学是怎样发展的,我国的军队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是怎样成长的。应当坦率地说,我国所有的军事首长是苏联军事学术的基本原则——坚决性、灵活性和机动性的彻底实现者。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他们就表现出了军事领导者的最宝贵的品质——对现代战争的本质与特点有充分的和深刻的理解并且能预见最复杂交战的进程和结局。

本书将对最高统帅部代表的工作给予足够的注意。

我对描写卫国战争的回忆录评价很高。苏联军队和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在同法西斯斗争中所建立的功勋,在世界历史上是无与伦比的。宣传这一丰功伟业对于培养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我这本书之所以迟迟出版,原因很多。首先要查阅大量的历史档案,好为书稿写作打基础。^{*}在战时,根本没想过将来要写一本关于战争回忆录的书。所有的心思都用到打仗上去了。有的回忆录作者常常引用自己在战争期间记的日记。当然,如果站在作者的立场上看,这是他们的幸运。显然他们有时间记下当时的人和事,而且他们的动机是诚意和善良的。但是,按照统帅部所规定的战时纪律和保密规定,他们是不该这样做的。就连我们这些总参谋部的负责干部,国防委员会和最高

* 书中正文中的楷体字是新版本增加的,后文同。——编者

统帅部所有讨论战役和战略问题的会议参加者，除了一般性的内容和数字，是不准许在自己的记事本上记载其他任何东西的。党认为，军队各级领导保守国家机密和军事机密具有重要意义。毫无疑问，战时在这个问题上严格要求是完全正确的。由我们起草而由大本营批准的给方面军的训令是已经作出决定的主要文件。根据大本营的命令，所有军团、兵团和部队的司令部都要把军事行动的经过记录在日志中。这些日志如今对回忆录作者，包括我在内，提供了很大帮助。

我为什么久久没有写出自己的回忆录，一个原因是我在战后很长时间内工作一直非常忙。1946年3月，我再次出任总参谋长和国防部第一副部长。1949年，我被任命为武装力量部部长，自1950年至1953年我担任军事部部长。长时间患病也妨碍了我写这本书。

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出版了第一批战争回忆录。我记得很清楚，军事出版社出版过两个回忆录集子：《攻克柏林》和《从斯大林格勒到维也纳》（讲第24集团军的英勇战斗历程）。但这两本书都没有得到И. В. 斯大林的赞同。他那时说，一个伟大事件刚刚过去不久，人们还没来得及平静下来，激情还没冷静下来，这时写回忆录还为时过早，写出来的东西也会缺乏应有的客观性。尽管我对这种说法有不同意见，但在一段时间内它不可能不影响我写回忆录的情绪。

本书出版后，我收到不少读者来信。使我欣慰的是，读者很关心书中所涉及重要问题和内容。我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大家的意见。虽然有些意见我并不同意，但我仍然以尊重的态度对待这些意见，因为这些意见是苏联爱国者诚心诚意提出来的。我将尽力对本书作些修订和补充。

作 者

答 读 者 问

1973年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我的回忆录《毕生的事业》。从那个时候起，我收到了读者的许多来信，他们在信中讲述了自己的意见和愿望，请我对某些问题进行解释。十分遗憾的是，我没有能力给每个人亲自回信和回答他感兴趣的问题，因为我没有时间，也没有这个力量。所以，我决定通过《军事历史杂志》来回答读者们提出的问题，这家杂志的编辑部十分热情，表示愿意提供版面。

在我看来，可以把读者提出的最重要的问题归纳为四类。

第一类问题：例如有人问我：您是直接参与制定对法西斯德国战争的战役战略计划的老资格的总参谋部工作人员，所以您应该知道，在战前年代，党、政、军最高领导人是否研究过如何在未来战争中领导武装斗争的问题。

对于这个问题，我可以作如下回答。每个交战国都建立了拥有很大权力的最高军事指挥部，它直接领导武装斗争。

在我们国家，苏联共产党在战争过程中建立的领导苏联武装力量军事行动的最高军事机关是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这是一个对武装力量实施战略领导的极其有成效的机关，它已经取得了应有的历史性承认。它对各方面军的武装斗争进程、对军队的战斗准备程度、对所有军事领导干部的活动向党中央和国防委员会负完全责任。战争期间，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党的领导下做了大量的工作。

就其编成而言，大本营并不大，而且它的所有成员还同时履行自己的基本职责。在整个战争期间，大本营通过总参谋部、武装力量后勤部、

• 此部分内容是1988年版增加的，因文字较多不改排楷体字。——编者

国防人民委员部各总部、海军、通过相应的方面军和舰队的指挥部，实施对武装斗争的领导。它的主要工作机关是总参谋部。

遗憾的是，最高统帅部的这种结构在我们这里并非在战争的最初日子里就已经形成。它是在防御交战的过程中诞生的，防御交战的进程表明，为了领导战斗行动，需要有一个拥有很大权力的权威性机构。

在战前年代，是否研究过武装斗争的军事战略领导问题呢？是的，研究过。1940年5月，根据总参谋长沙波什尼科夫的指示，我们总参谋部的领导人员起草了一份关于组建战时统帅部的决定，准备呈送联共（布）中央委员会。但是这份草案没有被政治局最终通过，仍然保留原先的状态：一旦发生大规模战争，将由以国防人民委员为首的总军事委员会领导军事行动，我们就是以这种战略领导结构迎来了对德国的战争。不过，这种战略领导结构只存在了几天的时间。战争爆发后的第二天就通过了一个关于建立更有效的武装斗争最高领导机关的决定，这个决定的草案还是在战前由总参谋部制定的。

我们总参谋部的负责人员都很清楚，通过了关于对武装斗争实行战略领导的决定并非就此完毕，大本营的组建过程还将继续下去，这一过程直到1941年8月才告结束。一开始，1941年6月23日成立了统帅部大本营，7月10日改为最高指挥部大本营，8月8日改为最高统帅部大本营。这不是简单的更换招牌，而是由于组建西北、西部和西南战略方向总指挥部引起的。接下去的步骤是任命斯大林为国防人民委员，尔后是最高统帅。为更顺利地进行武装斗争而集中战略领导的过程到此才算结束。

能不能在战前就充分解决武装斗争战略领导问题以应付对我国的侵略呢？当然能够，也是应该的。这种领导从战争爆发的第一天起就应该着手工作，用不着多方探索，而且应该更加顺利。最高指挥机关的组织结构问题没有解决无疑对领导武装斗争有影响，但是不应该忘记，这个问题不是一眼就能看出来的，事情并非那么简单。主要在于还不明确战争将如何展开和怎样进行，战争将向最高军事领导提出什么样的任务，需要在何种程度上把握军事权力集中并使其与政治领导相结合。

在战前年代，党中央和苏联政府在研究这个问题时首先注意的是

国内战争的经验。考虑到列宁虽然是反击革命的敌人和捍卫社会主义的斗争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但是他没有履行过总司令的职能,战前年代之所以没有通过关于组成以斯大林为首的统帅部大本营的决定,其原因显然就在这里。在估价未来战争时,国内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在领导国家中比后来的经验占有更大的位置。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马上就感觉到有必要让最有权威和公认的国家领导人来主持军事部门的领导工作,胜利进行战争的利益要求把斯大林任命到最高统帅的位置上,他是联共(布)中央总书记、人民委员会主席、国防委员会主席,他有解决保卫祖国问题的一切可能性。

最高统帅部大本营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对军事战略问题进行内行的研究,确定战局和大战役的企图及进行军事行动的方法。所有武装斗争的主要问题都列入它的职权范围,包括:领导军事行动,协调各方面军和舰队的战役行动,各军种的协同动作,准备和分配战略预备队,监督各方面军指挥部的活动。

大本营在指导战略军事行动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在军事艺术的所有指数方面超过敌人。大本营是军事思想、军事经验、军事智慧、主动精神的集中地。正如朱可夫所公正指出的那样,大本营看得更远更好,它的力量就在于能够对各方面军的事态发展进行深刻的、更科学的预见。

党中央政治局和国防委员会紧张地开展工作,满怀信心地引导国家走向胜利。党是团结的、有战斗力的,人民完全信赖和支持党。

有读者写信给我说,众所周知,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在战前年代尽了最大努力来提高国家和武装力量的准备程度,以便使法西斯德国不可能使我们猝不及防。那为什么1941年夏季的进攻对于我们国家来讲是如此的突然呢?为什么在战争的第一年法西斯分子的武装力量比苏联武装力量更为强大呢?我的回答是:这是由于德国一开始就处在更为有利的条件下,它已经打了两年仗,把所有的生产部门都转入了战时轨道。此外,它所拥有的军事经济资源几乎相当于所有西欧国家的总和。希特勒德国在占领了法国和几乎完全停止空袭英国之后,实际上在西欧已经没有军事行动,这使它有可能把几乎全部陆军和空军投入反苏战争。

我们失利的主要原因是错误地估计了法西斯德国可能进攻我国的时间，在准备反击最初的突击上疏忽大意。负责领导党和国家的斯大林力求避免同德国发生冲突，以便使军队和国家做好应付战争的准备。他不同意让边防军区的各部队进入充分的战斗准备。认为迈出这一步有可能被法西斯第三帝国政府利用，作为发动战争的借口。因此，边境地区的部队处在反侵略准备不足的情况下，希特勒军事机器的强大突击突然袭向他们，敌人在其主要突击方向上有3倍甚至5倍的优势兵力，我们的边防军各部队被迫分散地、在缺乏必要的空中掩护和炮火支援的情况下进入战斗。因此，他们不可能在防御地区阻挡法西斯分子，因而也不可能使从国家腹地抵达的部队更有组织地进入交战。

在准备应付战争的过程中还犯下了其他一些错误。我们没准确地判定了德国法西斯军队的主要突击方向，因而也没正确地分配自己军队的兵力兵器。在我们的防御作战计划中，把西南作为主要方向，而希特勒德国把最大的兵力兵器集中在西部，以便占领莫斯科，它处在更为有利的战略位置上。

从这一切可以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呢？拥有相当大的战斗实力的苏联武装力量由于种种原因，而主要是由于错误地判定希特勒德国发动战争的时间，在战争的头几个月处于不利的条件下，他们不可能同敌人进行平等的斗争。

为此需要预先使边境地域的各部队进入充分的战斗准备；组织有坚固工事的纵深梯次防御；调集预备队，以便敌人在某一方向突破时能马上使用他们。尽管我们在判断希特勒法西斯分子突击的主要方向上发生错误，但是在按计划把军队派往西南方向的既成条件下，应该从那里掉过头来，向德军“中央”集团军群的侧翼实施突击。如果那样的话，前线的态势有可能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再简略地谈谈为什么苏军统帅部迟迟不让边境地带的部队进入充分的战斗准备。在这一点上，几乎全都取决于斯大林的立场。应该指出，他正确地认为，当时在让军队进入战斗准备的问题上应该特别谨慎小心和沉着冷静，因为这涉及苏联的对外政策和国际立场。斯大林不同意让边境地区的部队进入战斗准备，因为他不想给希特勒德国以任何挑

起冲突和指责苏联侵略的借口。

与此同时,还要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即我国还没有做好大战的准备,他想赢得时间,以便巩固国防。我们极需一、两年的和平发展,以便完成军事计划提出的任务。诸如加紧新式武器和技术兵器的生产,征召新兵入伍并进行教育,按照现代战争的要求对指挥干部进行战役战术训练和技术训练,把全国纳入充分的战备状态,等等。

显而易见,可以找出足够多的理由来为延缓苏联介入战争的时间进行解释,斯大林坚持不给德国发动战争的借口的坚定路线也是符合社会主义祖国的历史性利益的。斯大林的过错在于他没有看到和把握住限度,继续坚持这一政策就不仅是不应该的而且是危险的。应该勇敢地跨过这一限度,尽快使武装力量进入充分的战斗准备,实行动员,把国家变成军营。接着,看来应该在某个地方把时间最大限度地拖延到6月份,但是可以进行某种隐蔽性的工作,并争取提早完成。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德国是作好了进攻我国的准备的,——在本世纪想掩盖这些证据是困难的。当时应该完全不必担心西方会出现苏联有侵略意图的议论。既然情况不取决于我们,那我们只好破釜沉舟,坚定地向前迈进一步。我们祖国的利益要求这样做。

我认为,战争头几个月战事发展很不顺利的责任不能都推到斯大林一个人身上,其他人也有责任。至少当时的国防人民委员和总参谋部的领导是有责任的,由于他们身居高位和对武装力量的状况负有责任,他们不应该什么都听斯大林的,应该更坚定地坚持自己的意见。

第二类问题。有读者问我,最高统帅于1942年7月底颁布了国防人民委员第227号命令,他有足够的理由给军队发布如此严厉的命令吗?

我认为,这个问题提得有点简单,但是意思是清楚的。担负莫斯科会战的各部队确实打得不错,他们顽强地抗住了敌人,证明臭名昭著的希特勒闪电战的可耻失败,并且战争出乎敌人意外地拖延下来,苏联军人的英雄主义是崇高的,得出没有必要发布上述命令的结论是不正确的。各部队在军事行动发展的最危急关头收到了这份命令,国家当时确实面临严重威胁。敌人急速冲向伏尔加河,法西斯统帅部计划占领巴库